

中国文库

· 艺术类 ·

中国书法史

两汉卷

华人德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文库
艺术类

中国书法史

(两汉卷)

华人德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书法史. 两汉卷/华人德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 9

(中国文库)

ISBN 978-7-5343-8661-9

I. 中… II. 华… III. 书法—美术史—中国—两汉时代(前 202 ~ 220) IV. J29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5672 号

责任编辑: 胡新群 徐金平

整体设计: 翁涌 李梅

责任印制: 董文权



《中国书法史》编撰工作委员会

顾 问：沈 鹏

主 任：张胜勇

副主任：朱关田

委 员：(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丛文俊 白谦慎 朱关田 华人德 刘 恒
刘 涛 张胜勇 徐宗文 黄 惇 曹宝麟

《中国书法史》各卷编撰分工

丛文俊 先秦·秦代卷

华人德 两汉卷

刘 涛 魏晋南北朝卷

朱关田 隋唐五代卷

曹宝麟 宋辽金卷

黄 惇 元明卷

刘 恒 清代卷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1
第二节	文字学的研究方法	2
第三节	文字学的意义	3
第二章	文字学的历史	4
第一节	文字学的起源	4
第二节	文字学的发展	5
第三节	文字学的现状	6
第三章	文字学的理论	7
第一节	文字学的性质	7
第二节	文字学的任务	8
第三节	文字学的地位	9
第四章	文字学的实践	10
第一节	文字学的教学	10
第二节	文字学的研究	11
第三节	文字学的推广	12
第五章	文字学的未来	13
第一节	文字学的展望	13
第二节	文字学的挑战	14
第三节	文字学的机遇	15
第六章	文字学的附录	16
第一节	文字学的参考文献	16
第二节	文字学的索引	17
第三节	文字学的附录	18
第七章	文字学的总结	19
第一节	文字学的回顾	19
第二节	文字学的展望	20
第三节	文字学的总结	21

第四章 东汉的碑刻(附砖文)/119

第一节 碑刻的演变和形制/120

第二节 碑刻的书法/136

第三节 东汉的砖文/166

第五章 汉代的书法家/177

第一节 各有风范的士大夫书家/179

第二节 专精草书的西州书家/186

第三节 工鸟篆八分的鸿都门学书家/190

第六章 东汉的书学/193

第一节 许慎《说文解字》/195

第二节 崔瑗《草书势》/198

第三节 蔡邕的书学理论/200

第四节 赵壹《非草书》/203

第七章 汉代的书法用具/207

第一节 笔/207

第二节 墨/211

第三节 纸/213

第四节 砚/218

第五节 削/221

附 录/225

两汉书法史大事年表/225

20世纪两汉简牍、帛书、金文、陶文等出土情况/236

两汉刻石文字目录/243

主要参考文献/276

计，陈留村薛，世式画学主气日中田实富日，前以立鼓博秦奇早而
干因面罪因强野吏耀秦。科宅留数博一县官，“计集”——科宅的数野巨
概述

相法。宝省以千日既从皇制秦，野整丁计抵计集秋，相耀雨云
，田制至丁（新宅文的一流式如相同出，景前，野式巨计计集而，冬蒙
宅文的一田制国秦通以丁留菊五，长科计特西计集麻案小丁制博秦
，甲望，并科，留制千田以，零计及，计署，甲率，计史，并陵及以，“算大”
。候计类一器灵，署愿

而，首律品志，令非古以千籍强禁丁式，野数制湖李率采又皇制秦
制，数才，并羽育只，消善案百千制，《计》《表》麻计史的一流《强秦》强焚
候香令强强五育，制式吏以限，香今去半要育凡。限之强焚前不计之制
制，字文的一流以同秦以景强，并善千制，典强案制麻计史的一流各。限重以
字文的一流以土数客五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各自为政。秦国崛起于
西土原周族故地。自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国力
逐渐强盛，在七国争雄的过程中，近攻远交，到秦王嬴
政时，以气吞六合之势，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事业，立号
为皇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

秦始皇为了巩固封建的大一统，规定了许多名物
制度，将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集中于一身。废除分
封制，推行郡县制，并颁布了一系列政令，采取各种措
施，其中之一是“车同轨、书同文”。战国时期，各国“言
语异声，文字异形”，因此，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
议，下令“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并对秦国使用的文字
进行整理，使之规范化，其字体称之为“小篆”。由李斯
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
敬作《博学篇》，这三篇字书为标准小篆的范本，秦朝
政府颁行天下，以教学童识字，同时作为统一的标准
文字责令在全国推行。

而早在秦朝建立以前,日常实用中已产生笔画方折、结体简约、书写便捷的字体——“隶书”,这是一种通俗字体。秦狱吏程邈因罪而囚于云阳狱时,对隶书进行了整理,秦始皇见到后予以肯定。当时奏事、官狱繁多,而隶书书写方便、简易,也同时成为统一的文字被广泛使用。

秦朝除了小篆和隶书两种书体外,还保留了以前秦国使用的文字“大篆”,以及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等,以用于幡信、符节、玺印、题署、兵器一类书刻。

秦始皇又采纳李斯的建议,为了禁绝群下以古非今、惑乱黔首,而焚烧《秦纪》以外的史书和《诗》《书》、诸子百家著作,只有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焚烧之列。凡有要学法令者,则以吏为师,有违犯禁令者处以重刑。各国的史书和儒家经典、诸子著述,都是以秦国以外的文字,即所谓“古文”书写而成,由是古文几乎绝迹了。这虽在客观上对统一文字起了一定作用,但却是先秦文化的一场大劫难。以后秦始皇又多次受方士之诒,而迁怒坑杀儒生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无论对文化的贡献和铲毁,都对后世,尤其是两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秦朝的苛法峻刑加上秦二世的昏庸残暴,使得民不聊生。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天下随之响应,秦王朝分崩离析,旋即灭亡。刘邦在历时四年的楚汉相争中,由弱变强,反败为胜,于公元前202年二月即皇帝位,都洛阳。五月,高祖刘邦接受戍卒娄敬的建议,迁都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

汉初,高祖采取了一些宽松的政策措施以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当时将相功臣皆山东布衣,缺少文化素养,常有“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一类的情况发生,“高祖患之”^①。于是采纳秦博士叔孙通的建议,让叔孙通参照前朝的礼仪,制定朝仪,树立起皇帝的权威。在行政官制上,继承了秦朝的政府机构体制。由相国萧何根据秦律内容,结合现实需要,制定了较为简易的《九章律》。以后还陆续废除了秦代遗留下来的苛法峻刑。如惠帝四年(前191)废除了“挟书者族”之律。高后元年(前187)废除了夷灭三族罪及“妖言令”。文帝前元元年(前179)除连

坐法,前元二年(前178)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前元十二年(前168)废肉刑等。在汉初六十余年间,黄老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政治上采取“无为而治”的方式。由于清平俭约,轻徭薄赋,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帝时虽有匈奴不断侵扰,以及景帝时有吴楚等“七国之乱”,但都未给经济带来太大的影响。所以到汉武帝初年时,社会繁荣,国富民强。《史记·平准书》中描写道:“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汉武帝因有足够强盛的国力,开始大规模地修建宫殿陵寝。在武帝即位的第三年,刚满十八岁,就设置茂陵邑,着手为自己预造陵墓了。武帝在位五十四年,这项工程一直进行到其死后,茂陵成了汉代诸帝中最宏大的陵区。元鼎二年(前115),“宫室之修,自此日盛”。是年春起柏梁台,之后又建造了许多宫殿苑池。元封二年(前109)扩建甘泉宫。太初元年(前104)二月,“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②。对秦代留下的羽阳宫、蕤年宫、橐泉宫,高帝时修建的长乐宫、未央宫,以及高帝长陵、惠帝安陵等都陆续予以修葺。这些宫殿陵寝穷奢极欲,宏伟壮丽。宫殿陵寝内需要大量的器用摆设,这些器物有铜器、漆器、玉器等,皆由少府所属各官署和郡国工官主其事。由于长期要满足皇家、政府大量的需求,这些御用、官用器物的设计、制作、监督、验收等,分工极为细致,各司其职,精益求精,责任到人。宫苑官府所用器物上大都书刻铭文,记有器物名称、归属、年月、官名、工名等,铜器还有重量、容积。以明器物用途、所属、工官责任,从而保证质量,防止逸失和盗铜。现在所见西汉宫苑寝庙的铜器铭文和文字瓦当之属,有很大一部分是武帝时物,以后诸帝及新葬时也陆续有所制作。这些郡国工官所贡器物和尚方、考工、东园、将作所造御用器物、兵械、随葬品,包括建筑装饰

瓦当上的铭文，大多精美绝伦，构思巧妙，应是各官署中主书文吏所设计书写，这些文吏都是按《尉律》由郡县至太史令逐级课试选拔出来的善书而精八体者^③。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出兵反击匈奴，并一直坚持至暮年。汉朝武帝以前，对匈奴都是采取和亲、互市、防御的策略，但匈奴还是时常侵扰，边患不断。武帝于是改变策略，一方面派张骞通使西域，联络西域诸国，以断匈奴右臂；一方面不断派兵主动出击匈奴。卫青、霍去病等都是当时名将，曾多次获得大胜。“丝绸之路”开通后，从元鼎二年（前115）始，先后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今均属甘肃）四郡。太初三年（前102）春，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出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外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遣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从敦煌向西至盐泽（今新疆罗布泊）往往起亭燧，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犂（轮台东）皆有田卒，置使者、校尉领护。至武帝晚年，由于长期外事征伐，内兴功作，耗财无数，民多穷困，社会危机严重。武帝颇悔征伐之事，虽匈奴侵扰之事未彻底解决，但边患已大为减轻，国家转向休生养息。西北边事，终西汉之世至新莽时，一直修武备而未敢懈怠。20世纪以来，在敦煌、居延一带亭燧关塞发现、出土的数以万计的简牍，就是从西汉武帝直至东汉初年这一时期边陲将佐吏卒遗留下来的文书簿籍、传符检署。

与秦国铲灭文化、焚烧《诗》《书》及诸子百家书籍不同，汉代统治者比较重视文化，思想和政治方面的控制较宽松。《汉书·艺文志序》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文帝听说齐有故秦博士伏生治《尚书》，年已九十余，诏太常派人往学，太常派遣掌故晁错去学习。伏生所传《尚书》二十九篇是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即今文记录下来的，这就是后世所称的今文《尚书》。其他的儒家经籍也陆续发现、整理或传授、记录，所书写的文字都是用隶书。这些传授和研究今文经籍的学派，称为今文经学。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好黄老之言的窦太皇太后去世，武帝亲

政。次年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使察举在两汉成为制度。随之，诏令“贤良”对策。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放在正统的地位。早在武帝亲政前的建元五年（前136），就为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设置博士，传讲经学。至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建议，为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博士弟子不断补充更替，“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阙；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④。这条建议武帝也采纳并实施了。自从有了这条入仕之途以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⑤。武帝还将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办学的方法推广至全国，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尊孔读经从此成了封建社会教学的主要内容。

武帝虽然罢黜百家，但对百家的著述并未像秦始皇那样予以铲毁，而是鉴于当时“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⑥。成帝河平三年（前26）因皇家藏书散亡较多，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刘向、刘歆父子曾先后负责校讎整理皇家藏书。诸侯王中也有为搜集文献旧籍不遗余力的。如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⑦。搜集抄录书籍是汉代人的风尚。当今出土的秦墓简牍，内容都是秦律和日书。而内地出土的汉代帛书、简册，除了儒家经籍外，还有《老子》《孙子兵法》《孙臆兵法》《管子》《晏子春秋》等百家著作，以及辞赋、医药书等。汉代人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古本、佚书

和墨迹,这些写书人又都是书法较优秀者。

河间献王搜集了许多古文先秦旧书,鲁恭王刘馀在扩建其宫室时,曾坏孔子旧宅,于壁中也发现用先秦古文写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孔子后裔孔安国后来获得了这批古书,并献书朝廷,因适遭巫蛊事^⑧,虽未能列于学官,然而从此有了古文经学。西汉只有今文经立于学官。

西汉前期,以《尉律》课试选拔能缮写释读九千字以上和精于八体书者,分别授予郡县和中央各机构的文吏之职。武帝则采纳公孙弘建议,以经艺取士。通经艺者所得的禄位,高于据《尉律》选拔出来的各级文吏,而且通经艺者升迁也较快。武帝以后各帝,经学博士弟子员名额不断增加。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增加一倍。元帝好儒,更设员千人,一度还不限员数,于郡国则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增弟子员至三千人。由于自武帝“设科射策,劝以官禄”,官吏多为文学之士,读书人往往“皓首穷经”。加上所治经都是立于学官的今文经,不必要在文字学上多下功夫。于是“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⑨。文学盛而小学衰了。这样,能识读古文字就成了极少数学者的专长。宣帝时,发现有齐人能释读秦李斯《仓颉篇》者,因《仓颉篇》中多古字,闾里书师都已不能识读了,于是命张敞从而受学。以后张敞能全部正其讹读,传至其外孙杜业之子杜林,始为《仓颉篇》作训诂。张敞由此爱好并擅长于古文字学。当时在美阳(今陕西武功西北)出土一古鼎,献至官府,大家都不识鼎上铭文,建议陈设在皇家宗庙。京兆尹张敞看了铭文,认为这是周天子奖赐给大臣,大臣子孙在上面刻铭记述先人功业,故此鼎不宜放在皇家宗庙。宣帝从其议。可见当时百官都已不识先秦古文了。张敞曾治《春秋左氏传》,属古文经学。

西汉中后期,一些古文书写的经书陆续发现,并在民间传授。这些古文经与今文经在内容、解释和观点等方面多有不同。与今文经着重于阐述圣人的微言大义不一样,古文经偏重于史实的解释。成帝时,刘歆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皇家藏书。每一书校毕,刘向就“条其篇目,撮其指

意,录而奏之”,汇成《别录》。刘向卒后,哀帝又命歆继父业,领《五经》。刘歆将所整理的群书编撰了一部分类目录——《七略》,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大类三十八小类,首列《辑略》汇辑全目总序和大、小序,并将《七略》奏上皇帝。刘歆在校中秘书时阅览并研究了许多古文经籍。在哀帝建平元年(前6),刘歆请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为今文派诸儒所拒绝。刘歆移书责让太常博士,申述了古文经籍的来源,并攻击今文经学“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实情,雷同相从,随声是非”^⑩。这样,就立即引起了以今文经大师、光禄大夫龚胜和大司空师丹为首的众儒讪谤,哀帝虽加偏护,刘歆还是怕获罪,而到外地去当了数年郡守。这是第一次经学今古文之争。

王莽秉政后,将古文经立于学官。于平帝元始四年(4),奏建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还征天下精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讖、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晓者,至京师有千余人,命记述学说,纠正谬误,统一异说。仅通小学者即有百余人,各记识解之字。扬雄取其有用者作《训纂篇》以续《仓颉篇》。王莽立古文经于学官,并不排斥今文经学,他利用双方经说,为其摄政篡汉、复古改制制造理论依据,同时也是争取各派知识分子对其支持的一种手段。新朝建立后,王莽倒行逆施,屡次更改币制、官制,法令苛细,徭役繁重,社会秩序混乱,阶级矛盾激化,加上连年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和灾荒,激起了各地农民起义。不久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公元25年,刘秀在农民战争和封建割据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了新的王朝。六月,刘秀称帝,即光武帝,年号为建武。十月,定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

光武帝年轻时为太学生,曾利用图讖为其起兵造舆论。即位后,尤

信讖言，儒者争学图纬。光武帝立今文五经十四博士于学官，而不立古文经。当时古文经学在朝野势力和影响均已较大，治古文经者迫切要求立古文经于学官。建武四年(28)，尚书令韩歆欲为古文经《费氏易》、《左氏春秋》立为博士，今文经博士范升与治古文经的韩歆、陈元等反复辩论。光武帝命立《左氏》学，以李封为博士，而李封正好病卒，于是《左氏》学复废。终东汉之世，古文经学未能立为官学。史称此为第二次经学今古文之争。以后经今古文互相诘难辩论还有过多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文经学的地位逐步提高，先后涌现了一批古文经学大师，如桓谭、郑兴、郑众、杜林、王充、贾逵、班固、许慎、马融、服虔、荀爽、郑玄等，而今文经学虽立为学官，始终处于官方学术的地位，但掺杂讖纬神学，使得学术气息越来越少。到东汉后期，古文经学占了优势，而今文经学已日薄西山了。蔡邕拜郎中后，校书于东观，发现经籍因辗转传写，文字多谬，俗儒说经，贻误后学。有人甚至私行金货，改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于是在熹平四年(175)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准许后，蔡邕参与书写于碑，使工镌刻，凡四十六石，用隶书一体，刻有《京氏易》《欧阳尚书》《鲁诗》《大戴仪礼》《公羊春秋》《严氏公羊传》《鲁论语》，共七经^①。为所立今文五经十四博士中各取一家。

自西汉武帝时起，即以经学取士。东汉除经学外，还注重品行。清季皮锡瑞《经学历史》云：“后汉取士，必经明行修，盖非专重其文，而必深究其行。前汉匡(衡)、张(禹)、孔(光)、马(宫)皆以经师居相位，而无所匡救。光武有鉴于此，故举逸民，宾处士，褒崇节义，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后汉三公，如袁安、杨震、李固、陈蕃诸人，守正不阿，视前汉匡、张、孔、马大有薰蕕之别。《儒林传》中所载如戴逵、孙期、宋登、杨伦、伏恭等，立身皆有可观。”光武帝时，察举取士又增加了敦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等名目。这些取士措施，对东汉一代崇尚名节起了很大作用。由于东汉前期几位皇帝大力表彰气节、提倡忠孝、激励操行、征用志士，以维护和强化统治，于是士大夫和儒生都以名节相尚，相互标榜。

两汉治经方式也有所不同,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西汉武帝时,官方设立的学校有京师的太学和地方的郡国学。至平帝元始三年(3),下令天下立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②。东汉继承了西汉的官方学校。班固《东都赋》中描写道:“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虽有夸张,但也可见地方官学的兴盛。各地由著名经学大师所办的私学也极为兴盛,其规模不亚于官学,或有过之。西汉末,有的经师已有门生弟子多至千余人者。而东汉则徒众在千人以上者比比皆是,甚至有超过万人者。《后汉书》所载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玄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恭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玄皆千余人,比前汉尤盛。”^③著录门生有这么多,往往多数人并没有机会得到经学大师亲授,而由大师的高足弟子传授,如郑玄年轻时在大儒马融门下,三年而不得见马融。东汉时一些官僚、豪强或处士多崇儒通经,或者本身就是经学大师,他们世代传经,收徒讲学,有些经师还累世居高位,如袁安家四世五三公,杨震家四世四三公。许多人为了得到利禄,往往依托于名门望族,著录为门生而并不受业。经师和官僚可以推荐自己的弟子门生去当官吏,公府州牧、郡县守令又可以自行辟用掾吏,这些被举辟者,即是举主的“故吏”。宗师和举主死后,其门生、故吏均要出钱为之立碑。有些地方官吏所修建的工程告竣,出征将领战争获胜,往往刻石颂德纪功,以夸耀治绩勋业,扬名显身。

东汉初,光武帝甚为节俭,其以手迹赐方国者,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又因西汉末年奢靡成风,盛行厚葬,故下诏提倡薄葬,并对自己的寿陵也是“令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④。此后,明、章、和、安诸帝皆有诏禁厚葬。和、安以后,母后为了临朝称制,把持权柄,有意策立幼主,又考虑到要巩固权位,就多任用父兄亲戚,充塞朝廷。及其满盈而败,常借宦官之手以行诛讨,以暴易暴,互相更替。故自东汉中期起,外戚、宦官相继擅权,社会黑暗腐败。这些当道的外戚、宦

官，骄横跋扈，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桓帝时外戚大将军梁冀与其妻孙寿，各自大起第舍，对街为宅，富丽宏伟，互相夸竞。“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藪，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⑥及梁冀诛，抄没其家产，折合钱三十余万万，可抵天下税租之半。宦官侯览于建宁二年（169）母丧还家，大起宅第、池苑、茔冢，夺人宅381所，田118顷，起宅16区。“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⑦其他有权势的宦官也无不如此。1953年在河北望都东关发现的大型壁画墓，墓主为浮阳侯，应是拥立顺帝的宦官孙程之墓，孙程卒于顺帝阳嘉元年（132），也有可能为其养子孙寿之墓。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安徽亳县（今亳州）南郊一带陆续发掘清理的许多砖砌墓葬，则是宦官曹腾家族的墓葬群。当时其家族有专门的制砖烧窑机构，墓葬中有大量的刻字砖，其年代为桓帝延熹七年（164）和灵帝建宁三年（170）。贵戚、宦官建造豪华宏大的墓葬，一般的地主士大夫也竞相奢靡，破家治丧。如崔瑗卒，其子崔寔“鬻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耗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⑧。《水经注》卷三十一《涑水》记载：蜀郡太守王子稚，无男而有三女，家累千金，子稚死后当葬，三女为了让父亲灵魂得到安宁，并能显彰父德，各出钱五百万，一女筑墓，二女建楼，以表孝思。二石楼“双跂齐竦，高可丈七八，柱圆围二丈有馀，石质青绿，光可以鉴，其上栌承拱，雕檐四注。穷巧绮刻，妙绝人工”。这类情况在当时十分普遍，王符《潜夫论·浮侈》云：“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櫛梓楸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都官属县，各当遣吏赍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王符约卒于桓帝永寿（155—157）末，桓、灵之际是东汉最腐败黑暗的时期，营造豪华墓葬成风，到处是石阙祠堂，碑碣表颂，墓中或彩绘壁画，或雕刻石室，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黄巾起义后，战乱不绝，中原赤地千里。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天下凋

敕，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于是立碑建阙之风，骤然歇息。

东汉后期，由于皇帝昏庸，政权主要由宦官把持。有权势的宦官除了本人作威作福外，其子弟宗族也横行于州国，竞为虎狼，噬食百姓。许多无耻趋势之徒都依附请托于宦官之门，宦官因把持了征辟、察举的权柄，任人惟亲。当时曾流行过这样的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⑧因长期察举非人，州郡牧守长吏多贪媚赃污，与宦官内外勾结，而太学、郡国学诸生的仕进之途却被壅塞。一些清廉正直的官僚士大夫于是联结外戚和太学、郡国学诸生，在朝野形成一股势力，以“清议”的方式共起反对宦官专权，所谓“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⑨。这样，引起了宦官集团对官僚士大夫的迫害，诬之“共为部党，讪谤朝廷”。桓帝延熹九年（166）在京师及郡国逮捕名士李膺、范滂等二百余人下狱。一年过后，由贾彪劝皇后父窦武谏帝，宦官们也怕事情闹大于己不利，就劝桓帝赦免“党人”，于是桓帝把“党人”全部释放，但仍书名于三府，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这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党人”虽遭禁锢，但誉满天下。天下士大夫都以“党人”为高尚，以朝廷为污秽，共相标榜之风更盛，指点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以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以李膺、杜密等八人为“八俊”，以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以张俭、岑晷等八人为“八及”，以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这是朝野士人和太学生标榜出来的三十五位大名士。郡国士人和诸生也仿效着为地方名士立号，并“刻石立埴，共为部党”。在褒扬名士的同时，相形之下宦官集团就愈益显得丑恶污秽了。公卿以下官员，怕遭贬议，无不造门谒见这些名士。灵帝即位后，窦武图谋悉数诛废宦官，却反遭宦官杀害，政权全归宦官掌握。灵帝由是下诏捕杀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宦官集团趁机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均指为“党人”，死、徙、废、禁又六七百人。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时在建宁二年（169）。直到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已爆发，为了镇压起义，灵帝才大赦“党人”，解除禁锢。由于桓、灵之际官僚士大夫和太学、郡国学诸生的清议、标榜，官僚